

◆白城英烈

吕明仁 (七)

●胡秀琴

蒙汉团结,共建通辽。

1946年2月23日,热辽边地委(即原阜新地委)根据辽西省委的指示,在吕明仁的率领下撤至通辽。由于管辖区域的缩小,地委改为通辽中心县委(对外称“通辽人民民主建国会”)吕明仁任中心县委书记。对于职务上的变化,一些干部思想不通,吕明仁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我们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克服地位观念。”表现了共产党员能上能下的革命精神。

通辽地处哲里木盟中心,是科尔沁草原的交通要道,公路四通八达。早在1944年,国民党地下组织就潜入通辽地区活动,抗战胜利后,他们与地方各种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首先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控制着通辽的党政军大权,一些日伪残余也兴风作浪,成立了维持会。他们造假币,出伪钞,扰乱金融市场,垄断经济命脉。网罗伪警察宪兵特务百余人,建立警察局和警察所,进行反共活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吕明仁率领干部来到以后,积极依靠工人群众开展城市工作,他一手抓反奸清算,恢复生产,维持社会治安,一手抓农

村工作,培养积极分子,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农民减租减息和肃清土匪的指示》,为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努力工作。

通辽有蒙古族人口几千人,虽然蒙古族人数不多,但对东蒙地区的革命斗争极为重要。吕明仁原在阜新任地委书记时,就注意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新四军三师共同做民族工作,尤其是上层统战工作。三师进入哲盟最早的是独立旅。12月中旬,东蒙内防部长、东蒙自治军司令阿思根邀请独立旅首先赴库伦旗王爺布桑仁钦就独立旅进入库伦问题进行友好谈判,最后达成独立旅在库伦建立办事处作为后方的协议。独立旅于12月28日进入库伦,建立了“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

1946年1月8日,吕明仁派阜新地委秘书长于洪琛率10余名干部来到库伦。经独立旅、阜新地委双方代表协定,库伦也同时作为阜新地委的后方根据地。办事处负责当地党政军民等各项工作,并配合旅后勤部、卫生部,筹备物资支援前线,

接收安置伤病员。办事处还大力开展地方工作,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上层统战工作。2月初,阿思根亲临库伦,与吕明仁、三师独立旅旅长商议在办事处武装“建国支队”基础上,建立东蒙自治军骑兵二师十四团。同月,正式建立中共库伦旗委员会,这是哲盟最早建立的旗县级党委之一。

吕明仁认为,做好哲盟上层统战工作,关键是在科左中旗,因为这里是哲盟的中心,又是东蒙的前哨。吕明仁首先做乌力图等人工作。乌力图在哲盟是蒙古族上层的头面人物。他原是伪满国务院地方处蒙古班的主要参事官,后为科左中旗旗长。他不但在哲盟,而且在东蒙也很有影响。经吕明仁多方工作,在我党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感召下,乌力图的政治立场有了转变。他同意共产党干部协助行署工作。他虽有些民族主义思想,但能审时度势,深明大义,表示真诚同共产党合作。

为了加强蒙汉团结,便于全盟的军事统一指挥,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建立东蒙自治军第二师及通省警备区联合司令部,简称“蒙汉联军”,由乌力图任司令员。联合司令部负责对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领导,协助地方开展工作,建立民主根据地,肃清土匪,安定民生。

(一百一十四)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B 白城记忆

我看我说

国产纪录片,如何持续向好

●刘阳

希望优秀国产纪录片越来越多,让更多观众看到它们的美好

近日,体育题材纪录片《棒!少年》在院线上映,以流畅的剪辑、动人的故事呈现引发热议。在不久前举行的2020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该片被评为评审团特别推荐优秀纪录片,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国产纪录片的关注。

纪录片被称为“时代影像志”,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传播价值。相关数据表明,近年来国产纪录片年轻观众激增,观看纪录片成为年轻人认知和探索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20》显示,我国纪录片发展实现多点突破、质量总体提升,目前进入高质量发展关键期,产业链各环节日益成熟,整体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近年来,大量优秀电视纪录片受到欢迎。如《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航拍中国》等,不仅创造了较高的收视率,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口碑。一些电影纪录片在票房和口碑上也取得了不俗成绩。以《棒!少年》为例,该片有大量侧写、空镜等镜头设置,以及成熟的叙事文本和剪辑手法,传递出关于时代变迁、少年成长、体育运动发展的人文思考,让观众获得剧情片般的沉浸式观感。观察前几年来上映的纪录片,《二十二》斩获1.7亿元票房,《冈仁波齐》以1500万元制作成本,取得近1亿元票房。这些成绩离不开影片本身内容质量的过硬,体现出国产纪录片在融合社会关怀与艺术品质方面的探索。

不过,和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一样,相较于电视荧幕和流媒体平台而言,对于纪录片来说,大银幕仍然是一道门槛,难以跻身电影市场的主流。如何让更多国产优秀电影纪录片叫好又叫座,推动电影纪录片更好融入电影市场,在电影市场获得更好的发展,为世界电影和纪录片行业提供中国经验?

一方面需要电影创作更加多样化,解决创作源头的问题,培育观众更加多样化的审美习惯,从而促进电影纪录片更好融入电影市场。而电影观众审美趣味的多元化,最重要的是要在创作上下足功夫,市场要提供包括电影纪录片在内的更加多样化的影片。另一方面,电影纪录片要取得市场成功,不仅要在创作上有好内容,创作之外的功夫也不能疏忽。要做好电影上映前的预热,在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得越来越好的基础上,用好上映期间的口碑拉动效应。

希望优秀国产纪录片越来越多,让更多观众看到它们的美好,更好地丰富电影市场,更加有力地助推电影市场的多样化发展,为世界电影和纪录片行业提供更多宝贵的中国经验。

成语里的中医

安步当车

●孙亚慧

战国时,齐宣王对一位名叫颜闾(chù)的隐士仰慕已久,召见他人宫。面对齐王的召唤,颜闾反过来招呼齐王走到自己身前,惹得齐王大为不悦。

颜闾便围绕“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齐王听罢豁然开朗,忙道歉并拜他为先生。颜闾拒绝,留下了“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的名句。

安步当车这个成语,原本是表达人生的淡泊志向,称赞安贫乐道的品质,如今人们往往将其字面意思拿出来,强调多走路的好处。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走路、散步,简单动作背后藏着健康密码。在中医里,散步是很重要的养生之道。人体一半经络在足部聚集,脾经、肝经、肾经、胃经等重要经络都经过足部,许多重要穴位也在足底。这些经络穴位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相连接,走路一定程度上能按摩足底穴位,疏通经络,增强免疫力。

无论是散步还是大步快走,都

能起到健足的功功,锻炼身体机能,舒缓压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长期坚持可以实现强身健体的目的。

如今的都市生活,大家多习惯以车代步,留给走路的时间越来越少。便利的交通条件极大延展了个人的活动半径,但也“侵占”了大量走路的机会,这也是不少人感慨自己“缺乏锻炼”的重要原因。想改善这种情况,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迈开腿”,多走点儿路。

除此之外,“安步当车”也是开给当代人的一剂“心药”——工作与生活节奏很快,压力难免引发困扰。淡然知足的精神状态,安步当车的悠闲心态,或许更容易帮我们寻到生活真谛。返璞归真,生活原来可以变得更简单。

最后要提醒的是,走路锻炼务必量力而行,不然很容易损伤膝盖,像一些不顾及身体可承受负荷、动辄“暴走”十几公里的做法并不可取。走路虽好,贵在适度,安步虽可当车,但却不能全然替代车的作用。那怕再喜欢走路,该上车的时候,还是得上车啊。

找好敲门砖(中)——明校勘

晋国三头猪过河去干啥?

●熊建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书都是靠抄写传播的。人工抄写,再仔细的人也会出错。因此,对于古书中的一些说法,不能轻信。

孔子的徒弟子夏,有一次旅行路过卫国,看到该国的史书中说:“晋师三豕涉河。”翻译过来就是说晋国军队的三头猪渡过了黄河。子夏说这肯定不对,应该是晋国军队在己亥年(我国传统纪年方式)过河,“己”与“三”相近,“亥”与“豕”相似,抄写时写错了。后来,子夏到了晋国,问起当地人这件事,回应确实是“晋师己亥涉河”。

“己”与“三”,“亥”与“豕”的字形相差挺大,怎么会抄错呢?我们今天写字机会少,难以体会。写得多了,确实容易出错,哪怕字形相差很远。古语说:“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因此,“鲁鱼亥豕”后来成为专门指错别字的成语。

古书在传抄过程中出错,在所难免。晋国军队三头猪这样的错误,凭常识就能判断出有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抄错了,要是不仔细辨析,是看不出来的。

《战国策》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触龙说(音同睡,说服的意思)赵太后”,讲述战国时期,秦国趁赵国政权交替之机,大举攻赵。

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援。齐国想,帮你行,但你得有抵押,不然这忙不就白帮了吗?于是一定要赵威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作为人质,才肯出兵。赵威后呢,溺爱长安君,舍不得,

执意不肯,并一意孤行,表示决不妥协。

后来,赵国大臣触龙用“爱孩子就要为他做长远考虑”的道理说服了赵太后,让她的爱子当了人质,换取了救兵。

这个故事曾经很流行的说法是“触善(音同哲)说赵太后”。对此,清代学者王念孙说了,《史记》里写的是“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触龙说愿意见太后。写成“触善”的原因是把“龙言”二字误合为一个字。因为古人写字是从上往下,所以出了这样的错误。1973年,马王堆出土了帛书,上面正是写的“触龙”。一桩公案才得了结。

触善愿意去见太后,从语义上讲也没错,不容易看出问题。这也就是懂校勘的学者,才能用啄木鸟一般的眼光,挑出这样的错误。

因此,校勘的作用,主要就是把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找出来更正,恢复原貌。古籍校勘之所以成为一种学术,就是因为古籍构成复杂,存在不同的写法和解释,必须在各种相异写法中,参合比较,判断正误,以存真复原。

怎么做?陈垣先生提出过“四校法”:对校,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刻本比较异同;本校,根据本书思想,对前后文矛盾之处进行逻辑分析;他校,搜集他书中关于本书的资料进行考证;理校,依靠校勘者本人的知识系统对文辞的疑难问题进行论证。

南宋学者彭叔夏,十二三岁的时候抄写太祖皇帝《实录》。他照着抄的书上写到“兴衰治乱之源”的时候,发现缺失了一个字。彭叔夏根据上下文琢磨,“治”后面一定是跟着“乱”才能说得通,于是写成“兴衰治乱之源”。后来,他得到该书的一个善本,上写“兴衰治乱之源”,这才知道自己当时改错了。他说,三折肱为良医,我这才知道书是不能凭借臆测轻易更改的啊。

校勘的高妙之处在此,危险之处也在此。

古书今读

陶渊明的底色和他的五次出仕

●钟书林



明仇英绘《桃花源图》。

之”,“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敦敢不至”。时不待人,功业未就,经权衡比较,于是选中了当时以整顿朝纲面貌而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央的刘裕。刘裕此时被拥为都督八州军事的镇军将军,陶渊明便出仕做了镇军将军参军。

陶渊明先后出仕桓玄、刘裕,都是抱着很大的政治期望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选择了东晋政局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刘裕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阴怀篡逆。严酷的政治现实使陶渊明认清了刘裕的伪善面目,其正当炽热的政治热情,犹如熊熊烈火被泼了几瓢凉水,他只得在油流中勇退。原本希冀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但在这污浊的官道中,开始对年轻时的抱负颇有些怀疑,感到内心矛盾极了。世道虽与他相违,但真要隐居不

出,实也有悖于自己最初的理想与壮志。他感到唯一能做到的是再次等待命运的安排。

因此陶渊明旋即出仕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刘敬宣为东晋名将刘牢之之子,以破桓歆功,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其地位可与刘裕相抗衡。可就是这位功勋赫赫的将军,却遭人无端排挤,不得不借安帝复位之际“自表解职”,不得善终。这一事件对陶渊明触动很大,推人及己,他由刘敬宣想到自己的遭遇,体会到若想建功立业,欲“大济于苍生”,是何其艰难!身居高位、功勋赫赫的刘敬宣,尚且落得如此结局,更何况一名小小的参军呢?陶渊明想到自己虽然先后四次出仕,政治理想却依然无法施展。他认识到正直的人不仅受谤,而且随时有坠入“密网”而丧失生命的可能,感到世道与己颇不相容,昔日的凌云壮志很难实现了。随着刘敬宣的解职,陶渊明也回到了故乡。这一次出仕本是带着最大希望的,是他一生中

我们今天谈论陶渊明,每每简单地将其视为隐士。其实,陶渊明的底色,并不是一位隐者。从他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到中年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再到晚年的“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大济于苍生”的济世热情,贯穿陶渊明的一生。

每位青年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并希望在社会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是这样。诗人“总角闻道”(《荣木》),少年“游好在六经”,植根于儒家学术思想土壤,崇拜孔子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他在《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鹰隼思远翥。”抒发了他辅佐明君、立业兴邦的政治渴望和救世济民的用世思想。其壮志凌云,不失侠客豪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渴望建功立业,英雄情怀跃然笔墨之间。

二十九岁那年,陶渊明入仕为官,出任江州祭酒。他怀着“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的美好愿景,秉持着“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开始实现其济世的猛志。然而,官场不同于田园,初涉官场的体验给他的美好理想泼了一身凉水,于时急转身退。《宋书》等记载的原因是“不堪吏职”,只得“少日自解归”,他受不了官场的种种束缚和折磨。而其中缘故,陶渊明也曾略有提及。其《饮酒》其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委婉含蓄地透露当时自己的心迹。

初仕的碰壁,让诗人不禁犹豫起来。但他的政治热情和理想并没有消退,而且对未来充满希望,等待“良主”的出现,一晃六年过去了。正踌躇立功的他,再次入仕当时的显赫人物——桓玄的军幕。很明显,诗人将这次入仕作为见识社会、体察仕途的好机会。在此期间,东晋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桓玄与司马元显两大权臣之间你死我活的厮杀,全然不顾国家大局,陶渊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入仕的愿望再次落空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所关心的不是救民于水火,励精图治,而是个人的私利。陶渊明借诗言志:“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虽然自己很想成就一番功业,但既然不能像宁戚那样干禄求官,那就再回田园吧。正当犹豫之际,他母亲去世了,就借此名义回到故乡。

再仕失败,陶渊明确实对官场有点冷漠和厌倦了。《和郭主簿二首》:“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裕,过足非所欣。春秋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诗中流露出闲适生活的自得与惬意。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陶渊明济世的热情不减。其诗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在看到自己收获劳动成果的同时,不禁对世道表示忧虑。所以,当守丧期满,年近不惑之时,他积极用世的激情再次猛烈迸发出来,《停云》《时运》《荣木》等系列诗歌,充分抒发了他这时时期饱满的政治热情。在《荣木》诗中,他以荣木喻人生短促,认为“晨耀其华,夕已丧

五次入仕的最高峰,也是他仕与隐的分水岭。从这以后,他人仕的政治热情明显弱化了,再也没有猛烈迸发过。

最后一次出任彭泽令,并非出自本心,而是为公田种秫而“足以为酒”去的。《归去来兮辞》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刚上任不久,从“仲秋至冬,在官八十日”,思想又有了波折。“及少日,眷然有归欷之情。”再加上督邮的到来,使他积于胸中多年来政治抱负未遂的愤怒与痛苦,彻底爆发而出,“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既是给官场的诀别书,也是对五次入仕理想的总结。以前抱定“大济于苍生”的政治理想,他认为“邦有道”而出仕;现在欲作贤臣而无路,欲有为而不能的情况下,他只能退而“独善其身”,“守拙归田园”。

虽然归隐田园,但还在观政治,也害怕卷入政治漩涡。归田园初期,陶渊明在“放歌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欢愉田园之乐。但五十岁(五十而知天命)的到来,壮志未酬,他不得不感叹:“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杂诗》)。这种忧思随着年龄的增长,疾患的病重,而不断加剧。尤其与当时政局联系起来,这种情感更为鲜明。严酷的政治形势使他对抱负的施展不再抱任何幻想,坚忍不仕。

在陶渊明五十六岁时,晋、宋易代,诗人心境又发生了很大改变,内心充满了愤懑,他把这股愤懑之情化成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充满豪情斗志的诗篇。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觉不觉得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但陶渊明深知自己无力扭转局面,他的理想和抱负完全全破灭了。为了躲避现实,他在耕种、读书中寻求慰藉。“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

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对人生不断的思索,生活的实践,特别是长期与劳动人民躬耕一处,激发了他那敏锐的思维能力,促使他的思想得到升华。在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一个超越于“小国寡民”又不同于“大同”社会的“桃源”世界。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思想的精华与顶峰,是他不断对人生、对社会思索和实践的结晶。也正因为他已不为世俗所累,因而对自己的一生遭遇,甚至生死安危,都能泰然处之了。在“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挽歌》)与“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的豁达爽朗与自歌自吟中,他将自己的一生推向了巅峰。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四十一岁归隐,其一生重要的经历,大体都是参照孔子的人生设定来践行的,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儒生坚定的人生奋斗目标:“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感士不遇赋》)这是陶渊明的底色。